

叙事学视角下《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研究

王 喆

(金陵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9)

摘要: 武侠小说是华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庸的作品因其历史性、文学性、故事性成为了武侠小说中的经典,而译介武侠小说是向海外读者推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以青年译者郝玉青翻译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叙事学翻译理论,从视角建构和标示式建构两方面对译作展开研究,指出译作与原作在叙事视角、人物姓名、章节名、文本素材等方面存在的不同,并分析这些不同对译文读者所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 《射雕英雄传》; 叙事视角; 叙事建构; 武侠翻译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0)02-0127-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0.02.005

A Study of English Version of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Theory

WANG Z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9, China)

Abstract: Wuxia fiction is a key compon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which Jin Yong's works, with their significant expressions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narration, are listed in the first rank.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Wuxia fictions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popularize the excellent culture of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theory, a study is made 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analyses different narrative perspectives of the translator in her translation, specifically the names of chapters and characters, which differentiate the translated version from the original one.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the added introduction, prologue, appendices and advertisement on the cover, especially the information they contain, is also evaluated.

Keywords: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narrative perspective; narrative framing; martial arts translation

一、金庸武侠小说译介现状

《射雕英雄传》是香港著名作家金庸于1959年写成的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同其之后所著的《神雕

侠侣》《倚天屠龙记》并称为“射雕三部曲”。而《射雕英雄传》作为“三部曲”之首,以其弘大的历史背景、鲜明的人物个性、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以及纯熟的文字技巧享誉两岸三地,作家倪匡称此书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界“巨匠”的地位^[1]。

收稿日期: 2018-07-28

基金项目: 金陵科技学院2017年校级教育教改研究课题(JYJG2017-35)

作者简介: 王 喆(1985-),男,讲师。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E-mail: blessingx@jit.edu.cn

金庸小说译介在西方起步较晚,其总计15部武侠小说中,迄今只有3部以全译形式推出英文版,分别是香港城市大学翻译系莫锦屏(Olivia Mok)翻译的《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和英国汉学家恩沙(Graham Earnshaw)翻译的《书剑恩仇录》(*The Book and the Sword*)。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以及“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的落实,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一大批优秀的中文作品通过译介传播到国外,瑞典青年译者郝玉青(Anna Holmwood)翻译的《射雕英雄传》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有关武侠小说译介的研究仍十分有限,根据洪捷的调查,从1979到2012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涉及武侠小说译介研究的相关文献总共才55篇^[2]。其中一些学者主要研究武侠小说的翻译策略,如吴玉光从归化、异化翻译角度出发,认为在译介初期,应采取归化翻译策略以消除武侠文化因素,增强可读性和趣味性,待英语读者对中国武侠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了解之后,再过渡到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逐步传播武侠文化^[3]。而如何判定英语读者是否了解了中国武侠文化,应该依据怎样的量化标准,以及这些英语读者指的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还是非母语读者,吴玉光并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标准。卢晶晶则认为武侠小说英译不必拘泥于归化异化之争,而应从翻译明晰化策略出发,讨论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将中国武侠精神、历史文化、故事情节全面清晰地展现给西方读者^[4]。然而,为了达到“明晰化”而对概念进行大段阐释,是否会破坏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让原本非常流畅的文学作品变成阐释中国武侠文化的工具书,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另一些学者则运用理论对英译本进行分析,试图总结出译者的翻译规律,如唐洁从意识形态和诗学出发,运用勒菲弗尔操控理论对译者翻译行为和策略进行探究,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使译文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并接受武侠译作^[5],但她并没有论证“一定程度”是何种程度,进一步改写或者少改写一点是否可行。本文无意探求一个与世皆准的武侠小说翻译策略,而是从叙事学的视角分析《射雕英雄传》郝玉青译本,通过实例分析译本中叙事视角的转换以及叙事建构的运用,并指出译者的这些处理方法对译文所带来的影响。

二、叙事学理论简述

叙事学(narratology)又称“叙述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套有关叙事、叙事文本、形象、事象、事件以及“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的理论^[6]。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经典”和“后经典”两个时期。其中经典叙事学脱胎于结构主义,旨在从不同文本中寻求叙事的一般规律并建构叙事语法,而后经典叙事学则跳脱出结构主义只关注文本的框架,注重作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关系^[4]。本文一方面将结合经典叙事学的结构主义视角探讨《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中视角的转换,另一方面将运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分析译者对译本所做的叙事建构,最后总结出这些视角转换和叙事建构对译文所产生的影响。

三、英译本中叙事视角的转换

事件不论通过什么方式来描述,必然要从一定的“视觉”范围之内展开,即选择一个观察点,通过一定的角度来描写^{[6]137}。这个概念在20世纪发展过程中,不同理论家给出了不同的术语,如视点(point of view)、叙述视角(narrative perspective)、叙事焦点(focus of narration)、过滤器(filter)、观察角度(angle of vision)等。这就导致了叙述视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混乱状态,尤其将“叙事者”和“感知者”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起来。法国学者热奈特认为“视角”和“视野”是过于专门的视觉术语,从而改用“聚焦”(focalization)一词来表示以上概念。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词也有着同样专门的视觉含义^{[7]197},加上“视角”一词在我国学界通用已久,故本文也选用“视角”一词来表示这一概念。

叙述视角从表面看似是“谁在看”的问题,实际上却体现出更为深层的“谁在感知”的问题,而感知往往可以体现特定的情感、立场以及认知程度^[8]。小说作者为了使读者能够获得更好的情感体验,会注重叙事视角的运用,因此分析和考察译文中对叙事视角的处理意义很大。

《射雕英雄传》是一部以第三人称写成的小 说。而叙事学中有关第三人称视角粗略可分为以下4类:1)传统全知叙事(又称编辑性的全知),在这种视角下,叙事者无所不知,并会发出居高临

下的道德评判; 2) 中立的全知, 这种全知视角下, 叙事者不做任何评论; 3) 选择性全知, 即全知叙事者放弃全知视角, 而将视角集中到某一个角色身上, 用角色的眼光来叙述, 这种视角又被称为第三人称视角叙事; 4) 摄像式外视角, 即采用全然不涉及人物内心活动的外视角来叙事, 读者读起来感觉就像看电影^{[7]247-249}。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采取了多种不同视角进行叙述, 而英译本中的叙事视角和原作并不全然相同。有些时候, 译文视角的转换会疏远读者与小说人物的距离, 并不利于主题的表达。

例 1 她再次醒来已是白天, 忍不住出声呻吟^{[9]38}。

译文 The sun was high in the sky by the time she next woke. A groan rose from deep within her^{[10]40}.

例 1 中, 原文采用的视角并没有超出人物(包惜弱)所能知晓的范围, 因而属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 也就是人物视角叙事, 而译文则采用了全知视角来叙述, 因为人物醒来的时候应在房间, 不可能知道当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采用人物视角叙事能够拉近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 而译者在译文中将视角转换为全知视角, 同原作相比拉大了这一距离。笔者认为, 这句话译为“The night had passed by the time she next woke. A groan rose from deep within her.”或许更好。

例 2 颜烈沉吟半晌, 似也十分为难, 终于说道: “娘子, 你信得过我吗^{[9]43}?”

译文 Yan Lie paused to think. “Madam, do you have faith in me?^{[10]46}”

例 2 中, 原文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有限视角, 也就是包惜弱的视角来叙事, 因为从包惜弱看来, 颜烈似乎十分为难。这样的视角能拉近读者与角色之间的距离, 具有较强的代入感。而译文则直接将这段心理描写略去了, 采用了摄像式外视角来叙述。这种视角虽然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但放弃了小说在揭示人物内心活动方面的优越性, 不利于表达主题^{[7]250}。因此笔者认为这句话中颜烈的心理描写不应省略, 试译为: Yan Lie paused to think for a while, searching for the right words to reply. Finally, he said, “Madam, do you have faith in me?”

例 3 那少女对他们浑不理睬, 笑道: “我是你黄贤弟啊, 你不睬我了吗?” 郭靖再定神一看, 果见她眉目口鼻确实和黄蓉一模一样, 说道: “你……

你……”只说了两个“你”字, 再也接不下去了。黄蓉嫣然一笑, 说道: “我本是女子, 谁要你黄贤弟、黄贤弟的叫我? 快上船来罢。”郭靖恍若梦中, 双足一点, 跃上船去^{[9]304}。

译文 But the young girl ignored them. “It’s me, Lotus. Brother Guo, have you lost all affection for me now?”

She did bear a resemblance to his friend, it was true. “But…you…”

“Yes, I’m a girl. I never actually told you to call me Brother Huang. Come now, we’ve got to hurry.”

Guo Jing stumbled forward and tripped into the canoe^{[10]328}.

例 3 中, 原文一直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事, 也就是采用郭靖的视角来叙事, 对郭靖的所见所想描写得十分细致, 而译文则采用摄像式外视角, 把许多细节描写大段省略掉了, 如“定神一看”“嫣然一笑”“恍在梦中”等原文中对郭靖心理的细节描写, 译文中都没有体现, 这样的处理方式尽管客观清晰, 但情感表达变淡了, 疏远了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笔者认为不应将这些细节描写省略, 试译如下:

But the young girl ignored them. Giggled, “It’s me, Lotus. Brother Guo, have you lost all affection for me now?”

Guo Jing concentrated on the young girl and found her bear a resemblance to his friend.

“You…you…” He stammered.

Lotus said, smiling beautifully, “Yes, I’m a girl. I never actually told you to call me Brother Huang. Come now, we’ve got to hurry.”

As if getting lost in a dream, Guo stumbled forward and tripped into the canoe.

译文中恰当的视角转换会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受, 或便于读者理解原文复杂的文化背景, 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如例 4。

例 4 张家口是南北通道, 塞外皮毛集散之地, 人口稠密, 市肆繁盛^{[9]250}。

译文 Kalgan sits at the meeting point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a lively trading centre specialising in furs^{[10]270}.

例 4 中, 原文和译文都采用了全知视角, 而在

“张家口”这一地名的处理上,译者并没有遵从汉语拼音译为 Zhangjiakou,而是采用了由蒙语演化而来的称呼 Kalgan(喀拉干)。“张家口”这一地名始见于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当地守备张珍在北城墙开一小门,因门小如口,加上又是由张珍开筑,所以得名“张家口”^[11]。而《射雕英雄传》故事发生的年代是南宋,首先张家口这一地名在当时并不存在,其次张家口从版图上属于蒙古人的统治区域,笔者认为译者将其翻译为 Kalgan,一方面更符合历史,另一方面站在蒙古人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会给译文读者不一样的感受。

例5 郭靖之母是浙江临安人,江南六怪都是嘉兴左近人氏,他从小听惯了江南口音,听那少年说的正是自己乡音,很感喜悦^{[9]251}。

译文 Guo Jing was delighted to have someone speak to him in his mother's tongue^{[10]271}。

例5中,金庸采用了全知视角,先阐明了郭靖的出身,接着解释为何他听到少年说话心生喜悦。与之相对,译者则直接将前面有关郭靖出身的描述略去不译,直接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即郭靖的视角来叙述。鉴于文化差异,英文译本读者对中国地理了解有限,如果把前面有关郭靖出身的描述翻译出来,势必需要对中国地理以及方言做长篇注释,这么做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难度,影响阅读体验,而将之略去不译,非但不会有损于主旨的传达,而且会让译文更加简练且清晰易懂。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将全知视角转换为第三人称视角是合适的。

四、英译本中的叙事建构

除视角转换外,《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中还做了一系列的叙事建构,其中最主要的建构方式是标示式建构。所谓标示式建构,即“使用词汇、用语或短语来识别人物、地点、群体、事件以及叙事中的其他关键元素”^{[12]187}。比如,在封面上印上了《爱尔兰时报》对该小说的评价:“中国版《指环王》”作为宣传标语,以《指环王》为标示来识别《射雕英雄传》。蒙娜·贝克指出,用来指示或识别叙事中关键元素的标识给人们提供了诠释框架,从而引导或制约我们对当前叙事的反应^{[12]187}。“《指环王》”这一标识给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的框架,而该框架与《射雕英雄传》原作其实并不吻合,甚至相去甚远。《指环王》作为一部魔

幻小说,作品中的时代、人物、魔法理论等都源于想象,而《射雕英雄传》中,尽管其中功夫的部分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作品发生的时代和其中一些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中国版《指环王》”这句标识语尽管在营销角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读者,但会误导和制约读者对《射雕英雄传》这一作品叙事的预期和理解,笔者认为并不可取。

除了封面宣传语外,译者还对章节名做了一系列标示性建构,如下面的例6和例7。

例6 黑风双煞^{[9]1}

译文1 A Dark Wind Blows^[10]

译文2 Twice Foul Dark Wind^{[10]156}

“黑风双煞”在《射雕英雄传》中指两个人物——铜尸陈玄风和铁尸梅超风,译者在第四回的正文中将之译为“Twice Foul Dark Wind”,而在章节名中,并没有根据原著将之译出,而是采用了更为形象的描述性表达,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塑造了肃杀神秘的气氛,另一方面也便于对中国武侠小说不甚了解的西方读者理解,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是可取的。

例7 比武招亲^{[9]1}

译文 For the Maiden^[10]

第七回章节名“比武招亲”的翻译与例6有异曲同工之妙。“比武招亲”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招亲方式,一般由女方家长设下擂台,候选人通过公开比武的方式获得婚约。西方历史上唯有“决斗”(duel)与之类似,但仔细比较又有所不同,因为西方的“决斗”多发生于两个情敌之间,而中国的“比武招亲”则是许多候选人公开比武。因此译者没有将该章节名译为“Duel for Marriage”,而译为“For the Maiden”,一方面避免了西方读者混淆“决斗”和“比武招亲”的概念,另一方面也设下悬念吸引读者读下去,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可圈可点。

除标识语和章节名之外,译者还对译本中部分人物姓名做了建构处理。比如本书主角黄蓉(Lotus Huang)的名字通篇采用意译,而郭靖(Guo Jing)和杨康(Yang Kang)的名字一开始做了解释,而在正文中通篇采用了音译。

例8 丘处机微一沉吟,说道:“郭大哥的孩子就叫郭靖,杨二哥的孩子叫作杨康,不论男女,都可用这两个名字。”郭啸天道:“好,道长的意

思是叫他们不忘靖康之耻，要记得二帝被虏之辱。”丘处机道：“正是！”^{[9]25}

译文 Qiu Chuji sipped from his bowl of rice wine and thought for a while. “For Master Guo’s child I suggest Guo Jing, meaning ‘Serenity’, and for Master Yang’s child, Yang Kang, meaning ‘Vitality’. This will remind them of the humiliation of the year Jingkang, when Kaifeng was sacked and the Emperor captured by the Jin. These names can be used for girls just as well as boys.”^{[10]23}

上面的例子中，译者分别对“靖”和“康”两个字做了解释，在书后的附录3^{[12]388}中，译者还进一步对“靖康事件”做了较为详尽的背景介绍。然而，译者并没有说明为何郭靖和杨康的名字最终采取了音译的处理方式。

而对于黄蓉的名字之所以译成（Lotus Huang），译者在译本末尾附录3中解释了个中缘由：“尽管许多武侠迷对黄蓉的拼音名 Huang Rong 更为熟悉，但我依旧将之译成 Lotus Huang。因为黄蓉刚出场时并未显露身份，郭靖被蒙在鼓里，而读者没有。一见到“蓉”（Lotus）字，便知这个小乞丐定是女子，因为这个名字十分女性化，男孩子是不会用的。而郭靖几乎不认字，加上“蓉”在中文中单凭发音难以辨别，是故郭靖并没有猜到黄蓉的真实身份。……这是金庸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中文读者也能心领神会。若将“蓉”译成拼音，那英语读者便会和郭靖一样一头雾水了。”^{[12]392}有了这段解释，读者能够较为清晰地理解译者对黄蓉这个名字采取意译的原因。

对于配角人物名，译者的译法也不统一。如包惜弱（Charity Bao）、李萍（Lily Li）、段天德（Justice Duan）等人采用了意译，而柯镇恶（Ke Zhen'e）、朱聪（Zhu Cong）、丘处机（Qiu Chuji）等人则采用了音译。对此，译者并没有做出充分解释。因为被音译的人物名并非无法意译，如柯镇恶便可意译为 Justice Ke，是故译者对小说人物名的翻译处理方法可能会造成书中人名欠统一，给读者造成困惑。此外，由于译者意译人名时采用的是西方国家先名后姓的习惯，而音译时保留了中国先姓后名的传统。这样一来，便造成了译作中的人物姓名颠倒混乱的情况，使读者难以分清人物的姓和名，而中国文化十分注重宗族，所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姓

名混乱会直接影响读者对人物身份的识别。笔者认为，《射雕英雄传》小说中人物众多，译者在处理时应一以贯之，或全部音译，或全部意译，如做特殊处理，则应一一在文中或附录中以注解形式说明，另外姓与名孰前孰后也应保持统一。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中，除了译者对人物姓名进行的建构之外，出版方还在文本素材方面做了较大改动，添加了译序（Introduction）、人物介绍（Characters）、开场白（Prologue）、附录（Appendices）等内容，通过这些文字对本书故事的背景、主要人物、中心思想等做了概括。从叙事学角度来看，通过省略、添加等方式对文本素材进行选择性地采用能够抑制、强调或铺陈原文中隐含的叙事或更好一个层面的叙事的某些方面^{[12]173}。《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中所添加的译序、开场白、附录等都采用了全知视角，在译序中，译者还加入自己的评论，属于编辑性全知视角。如：“许多人认为金庸作品的世界对于英语读者来说过于异国情调，过于中国化，而这个有关爱情、忠诚、荣誉，以及个人抵抗腐朽政府和侵略者力量的故事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杆^{[12]ix}。”译者通过译序对原作文本做的概括和界定，一方面有助于吸引读者，让读者了解本书的大致内容，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读者来说，这样断然的评判和定义会引起他们内心的不快。此外，在开场白中，译者基于自己的理解对原作的叙事做了建构，如：“临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这个商业中心有高耸密集的木质房屋、庭院宽广的石砌房子、卖肉包和面条的小摊，以及装潢精美的茶肆，茶肆中售卖各种宫廷美食，如脆皮鸭、蒸螃蟹、獐肉、鹅肉等。”^{[12] xviii}可是，这段在原作中并没有出现的描写有些地方并不符合中国历史。根据刘学忠的研究，茶肆始于唐朝，在宋朝兴盛一时，除了提供茶水服务之外，还兼营歌舞娱乐和餐饮，但茶肆在社会中地位并不高，为士大夫阶层所鄙夷，大臣私人茶肆会遭到非议甚至弹劾^[13]。因此茶肆虽然提供餐饮服务，但目标顾客群是消费力有限的普通百姓，不可能出售宫廷美食。因此译者在没有详细查阅资料的前提下，基于自己对中国古代人民生活状态的想象撰写出来的个人叙事虽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但其中不符合史实的部分会融入西方读者的集体叙事，让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历史产生误解。

（下转第167页）

- [4] 黄桂花,吴蔚.总书记带来温暖和感动[N].贵州都市报,2014-03-08(01).
- [5] 孟利铮.听习近平讲什么是乡愁[J].决策探索,2018(19):70-71.
- [6] 习近平.放活土地经营权要把选择权交给农民[N].新华日报,2016-04-29(01).
- [7] 习近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8-10-26(01).
- [8] 牧归冀.诗经(插图版)[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
- [9] 王昶.诗词曲名句赏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10] 王爱霞.当代乡愁问题的环境哲学研究文献综述[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4):119-121.
- [11] 冯丹.城镇化建设中的乡愁问题研究[D].郑州:中原工学院,2016.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4] 邹之坤,张阳.生态文明在何种意义上是人类的必然选择[J].长白学刊,2017(1):38-42.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编辑:程爱婕)

(上接第131页)

五、结束语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译者和出版方对原著的叙事视角、人物名、章节名、封面文案、译序、开场白、附录等做了一定程度的叙事建构。其中叙事视角的建构中,有些确实可以消除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阅读屏障,也有些处理拉大了读者与书中人物的距离,并不利于人物的塑造。对于人物名的翻译,译者时而采取音译,时而采取意译,尽管在附录中针对特定人物名的翻译做了解释,但稍欠普遍性。在章节名的建构上,译者通过灵活处理,对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的章节名进行改译,便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阅读。对于封面文案的建构,尽管从营销角度或许能够吸引读者眼球,从而提高销量,但如“中国版《指环王》”等明显与原文不符的叙事建构会误导读者,使其对作品产生错误的预判。另外,英译本中增加的译序、人物介绍等文本素材,一方面比较贴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能让不熟悉原作的读者对作品的历史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另一方面其中不符合史实的内容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读者产生疑惑,甚至误解。

参考文献:

- [1] 杨匡汉,杨早.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 [2] 洪捷.武侠小说译介研究三十年[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1):73-78.
- [3] 吴玉光.归化还是异化:金庸武侠小说的英译策略探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19(2):87-90.
- [4] 卢晶晶.《雪山飞狐》英译明晰化策略——兼论武侠小说翻译之道[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22(1):126-129.
- [5] 唐洁.武侠小说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恩沙《书剑恩仇录》译本为例[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32(4):140-142,151.
- [6]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7]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8] RIMMON-KENAN S.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M]. London: Methuen, 1983.
- [9] 金庸.射雕英雄传[M].北京:三联书店,1994.
- [10] JIN Y. A Hero Born: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Volume I [M]. Translated by Holmwood A. London: MacLehose Press, 2018.
- [11] 梅铂,赵志莲.从地名传递的文化信息中品读张家口[J].档案天地,2015(9):61-64.
- [12] 蒙娜·贝克.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M].赵文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3] 刘学忠.中国古代的茶馆[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2):28-33.

(编辑:朱渭波)